

【回望经典】

重温《论语》：理解仲尼之光

孙向晨

第一次全文阅读《论语》已是大学一年级，读了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很羞愧没读过《论语》，便囫圇吞枣读了一遍，浮出了一个亲切的孔子形象，一洗连环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留下的阴郁印象。那个渴求西学的年代，李定生老师曾问，向晨是否继续读中国哲学研究生？内心的理想却是要修数理逻辑。

之后读过李泽厚、钱穆以及李零版本的《论语》，都曾经热门，与其说读《论语》，不如说想看看这些思想者的解读；与言必称何晏、王弼；皇侃、邢昺；《集注》《集解》不同，并非专业研究，一位研究西学学者的爱好而已。

不久前，与几位朋友又开始读《论语》，往往一两节讨论一个晚上。再捧《论语》，难免让人狐疑。如此汲汲于孔子，似过于迂阔。《论语》万把字，在古代儿童即能诵读；读起来并不艰深古奥，在黑格尔看来无非是些道德教化的老生常谈；如果孜孜于“微言大义”，则未免故作神秘。一起读读，至多算是“温故知新”。

经典的内化与对话

经典经得起常读，早已超越了普通读物。像《论语》《理想国》这样的经典，实在是构建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框架，构筑了人们思考生活的路径。这种框架至今还起作用，不仅在于它们深深地嵌入历史，更在于它们依旧影响现代话语。1960年代末出生的我们，视“传统”为粪土，但再激进也难脱生活语言。即便极端年代，“温故知新”也还是成语。汉语充满源自《论语》《老子》《中庸》等典籍的成语与老话，因此拿起《论语》便觉亲切，一些早已预装在头脑中的词汇便扑面而来。语言从来不是空泛的，而是有所承载，并暗暗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经典之为经典就在于它塑造了我们的文化结构。历史会有变迁，但并非任意，往往会聚焦在某条主线上。所以，怀特海说西方哲学二千年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解，此言不虚。信奉多元化的现代常常迷惑人们，遗忘了历史是有主导性传统的，西方的“两希”，中国之

“儒道释”。但凡一种有生命力的结构并不僵死，它会与世界的变迁相与互动。黑格尔很明白柏拉图是这样的，但他不懂孔子同样如此。郑玄的《论语注》迥然有别于朱熹，郑玄面对汉代今古文的融汇，朱熹需化解佛道的冲击，然而他们始终会“重温”《论语》。

六问“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的成语源自《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如此显白，细究起来，却意味深长。从词意上而言，“故”在孔子时代究竟意指什么？先王之道，抑或周代礼制？“新”又指什么？新知识，新感悟，新应用？如何理解“温”字？“温，寻也”，“寻”的不同理解表明对“故”的不同立场，是“重温”还是“寻绎”；“知”在现代语境中会被质问，究竟是 learning，是 knowing，抑或 understanding？在逻辑结构上，何晏的注释中，“温故”与“知新”是并列关系，朱熹的集注中“温故”与“知新”之间则有一种递进；递进中又包含了多种可能性，如钱穆所说，可以是在旧闻中每有新得，也可以“故”乃先王六经，“新”则为后世斟酌，表现为一种“体用”关系；“温故”与“知新”的联结牵涉到“师”的界定，《礼记·学记》中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温故”似乎还不够，为师必须“知新”，那么“温故知新”对“师”是充分的吗？或是“师”的必要条件？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师”就是助产士，催生你已有的知识，并不涉及“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师”道。在历史语境中，“温故而知新”为什么放在“为政篇”而不是“学而篇”？它与后一条“君子不器”是否有某种连贯？等等，等等；所有的可能性都逻辑地蕴含在经典的表述中，不同的理解组合却能岔出许多路径，导致迥异的解读。

延续着光的灯心

经典不是个人的作品，在历史的解读中积淀了众人的智慧，由此经典便涵摄了深厚的生活底蕴。解读经典，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的经验投射进去，从而与经典形成一种跨时代对话，在提炼自己解读时也



▲北京国子监孔子像（视觉中国）

会把那个曾经的世界从经典中活泼地释放出来，让我们在有限时空中容纳更多世界。如果是几位朋友一起来念，那就更加意味深长。

那么，今天我们还能把《论语》的主角孔子称为“圣人”吗？李零老师给出断然否定，孔子是人，不是圣。当年的孔子惶惶无奈，像丧家犬，更是堂吉珂德。孔子也感叹“丧家犬”，这个评价似成的论。可是，我们还应该认孔子是“圣人”，这一称谓并不拘泥于道德评价。孔子称“周公”为圣人，因为周公制礼作乐，为天下谋秩序；以孔子看周作的眼光来看待孔子，那么他的学说亦深刻地形塑了中国文化传统。称

孔子为“圣人”，一如称颂柏拉图之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伟大，他们都是轴心文明的缔造者。“圣人”之为“圣人”，不能只着眼于个人，而需感念其创造历史的贡献。索罗斯在古希腊波斯很了不起，但他所造就的古波斯文明并没有传承下来，自己也淹没在历史尘埃中；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博物馆从10、11世纪开始陈列，接受基督教后才有记录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就能理解为什么“天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在茫茫历史长河中，经典就是延续着光的灯心。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指导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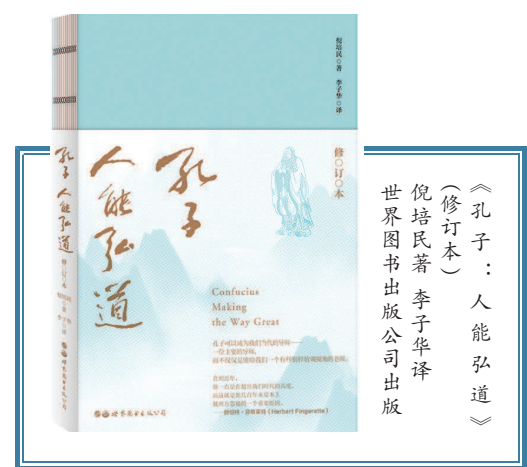
人能弘道？道亦弘人

朱承

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究竟怎样的人才能使后人发出“天生仲尼，万古长于夜”的感叹？事实上，孔子的人生经历并不具有十分的传奇性，他只是春秋末期鲁国很多没落贵族的普通一员，使得他留名千古的是他的思想，是他所创立的儒家之道。

脱离儒家之道，把孔子一生演绎成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故事大抵难以成功。孔子的生活体现了他所追求的“道”，他是儒家之道最忠实的践行者、推动者，儒家之道的卓越“功夫”而成为精神上的不朽者。美国格兰谷州大学终身教授倪培民所著《孔子：人能弘道》一书，生动而深刻地实现了儒家之道与孔子人生的相互激荡，展现了“人能弘道”与“道亦弘人”的思想图景。

孔子对儒家之道的确立、弘扬和阐发起到了最大的作用，故而人们以孔子自己说的“人能弘道”来赞美他的贡献。而在思想史的长河里，儒家之道也不断拓展了“人”的生活境界，可谓“道亦弘人”。这里的生活境界，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由于后世广泛地接受了儒家之道从而尊崇孔子本人，孔子也因之成了儒家之道的符号；二是由于儒家之道的致思取向在于启发



都给普通人的人生以穿透性的启发。倪培民认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之道以“修炼和践行自己的仁”为“功力”，以“礼乐规范”为“功法”，从而实现一种经“修炼而成的自发性”而生成成的“美好生活的能力”，抵达理想的人生境界。而这一切，都在于儒家之道具有“生活艺术”的意义且涵括了“修炼、践行和生活方式”的“功夫”。就此而言，孔子的儒家之道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弘人”之义：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生活”本身去理解“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超越抽象的理论体系和道德原则，在具体的“生活能力”中去理解“生活”，所谓“不离日用常行中，直道先天未画前”；另一方面，“功夫”的累积性与生成性之维，可以帮助人们摆脱教条的束缚，从而在变动不居的社会和文化境遇中做出恰当适宜的人生抉择，养成应对人生变化的“艺术”，从而实现个性自由与社会团结。简言之，孔子的儒家之道引导人们在生活中形成领悟

生命、完善自我、成全他人的智慧，这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当然，孔子人生及儒家之道仍然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在阐述儒家之道普遍性意义的同时，如果不对孔子的时代乃至中国整个传统社会有着前提性认知，我们则可能就会对孔子应对的问题及其处理方式缺乏宏观背景的理解，只能成为既有文献的转述者，而不是鲜活思想的领会者。

在当前社会大众的视野里，孔子时而被“鸡汤”，时而被“丧家狗”，颇有些“鸡犬不宁”的意味。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人能弘道》以一种世界哲学的眼光，从“应该过怎样的人生”的问题出发，展现了孔子的“功夫之道”，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其最初创作动机是向英语世界介绍孔子，但由于该书灵动性的叙述风格与创造性的思想深度，同样可以给较为熟悉孔子的汉语读者以别样的阅读体验与思想启发，更能促使人们对“何为良好人生以及如何过好人生”的问题有所思考，就此也具有了一种“弘人之道”的意义。

当年司马迁在孔子故居逗留，“想见其为人”，久久不肯离去，不知是否也是受到了孔子“弘人之道”的强烈吸引？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智慧研究院教授）

「计算人文」 离我们有多远？

罗争鸣

一个文史研究者，听闻“计算实验方法”，总是有些隔膜，也感觉是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2017年夏天在美国麦迪逊市，我第一次碰到薛霄教授。席间我们聊起中国历史上的权力制衡和演变问题。薛教授对这个问题极有见地，说起头头是道，但当他说到中国历史上的权力互动大概也能用一种方法找到规律时，我对这种可能性深表怀疑。回国后不久，薛教授转岗至天津大学。最近他寄我一本新书《复杂系统的计算实验方法——原理、模型与案例》，特嘱我闲时翻翻。前几天，半夜睡不着，拾起翻览，发现这是一本直指人心的“大书”，其娴熟的理论驾驭能力，着实令人佩服。

经典物理时代，一项研究成果首先要要有实验支撑，其次，别人还能重复这项实验，这是科学成果获得认可的基本要求。但是，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在很多领域充满了不确定性，并非是达尔文、培根、牛顿、伽利略、笛卡尔等建立的近代科学体系和相应的数学方法可以完全解释和说明的。这种不确定性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信息科学、社会学等领域普遍存在，而这些无法用传统实验方法得以认知和确证。即使一定要通过实验验证，也会面临经济、法律和道德等社会问题和高危风险。那么如何分解还原复杂系统，只能另辟蹊径，计算实验方法应运而生。

在秩序与混沌的边缘，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本身就是科学观念的巨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复杂系统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1999年，美国《自然》杂志出版一期以“复杂系统”为专题的专刊，对化学、物理、神经学、动物学、自然地理学、气候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复杂性进行了报道和研究，归纳出复杂系统具有开放性、自组织性、非线性、涌现性和层次性等特征。复杂系统不可能利用某一个学科门类加以研究，计算实验必须是多学科协同合作，是典型的交叉研究。在历经统计物理、进化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不同发展阶段后，计算实验方法已经进入建模仿真所需要的大数据研究，复杂网络模型和平行系统理论也进入研究视野，在流行病学、经济学、交通系统、战争模拟系统、矿山应急救援等领域，计算实验方法逐渐推广，而在社会学领域，计算实验方法更是风生水起。2009年2月，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的15位顶尖学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联名发表了《计算社会科学时代的到来》一文；2012年，14位欧美学者又联合发表了《计算社会科学宣言》，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的复杂行为模式提供了重要方法。

薛教授的《复杂系统的计算实验方法》分为“方法论论篇”“计算模型篇”“应用案例篇”三个部分，对复杂系统计算实验的系统框架、核心技术和具体应用做了全面的论述，其中人工社会的糖域模型(SugarScape)和社会生态系统(SLE模型)涉及性别、出生与死亡、文化与冲突、组织演化、社会变迁等问题。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在计算模型和应用案例方面的论述并不充分。但我在跟薛教授的进一步交流中得知，他目前正致力于“反事实算法”下的计算实验方法与人文科学的交叉研究，即针对某个历史节点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推演和计算，进而得出值得借鉴的历史教训和发展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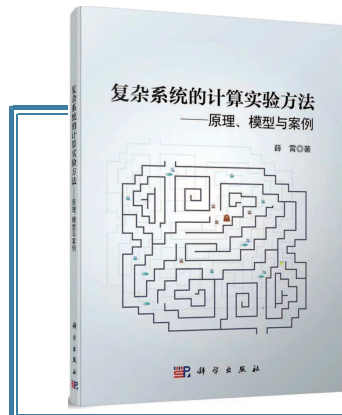
计算方法与计算实验方法，虽然只有两字之别，但有本质不同。计算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在前数字化时代就已存在。比如日本学者深泽幸一在讨论韦应物抒情诗“清赏”风格时，就据《韦苏州集》571篇诗作统计出含有“清”的词语有134个，占23%；王维432篇诗作中有60个，占比13%；孟浩然218篇诗作有42个，占19%；而六朝时期的谢灵运92首诗作中43个，谢朓136首诗作有62个，二者都接近50%，进而指出，韦应物在“清”这个审美特征上，与谢灵运、谢朓更有相通之处（深泽幸一《韦应物的抒情诗》，见《诗海撈月—唐代宗教文学论集》，王兰、蒋寅

翻译，中华书局，2014年）。现在大多数历史文献都已经数字化，展示方式更加多样，百分比统计更加便利，复杂检索更加迅速，但有一些数字人文研究，究其路数，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进。

计算实验方法是在反事实思维(Counter Factual Thinking)基础上，针对在相同条件(因)下，社会复杂系统中未曾发生的事情(果)的一种心理学家诺尔贝特·奥尔森提出的。它是根据历史文献构建出来的、模拟的社会复杂系统。反事实思维是美国心理学家诺尔贝特·奥尔森1982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模拟式启发》(The Simulation Heuristic)论文时首次提出的。它是基于人类非理性假设的前提下提出的，简单地说，就是人类意识普遍存在“如果当时……，就会/就不会……”这样一个反事实的思维过程。目前，文献数字化的量级已经从TB级发展到PB级，随着5G网络的发展，大数据技术已经为人类学、计算实验方法打下良好基础。但人文科学的海量文献数据，往往面临真伪、重复、歧义与校释问题，文献考订工作，非人力不能为之，如果这个问题也能通过计算实验方法得以解决，那么人文科学的计算实验方法将会获得突破性进展。

我们现在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即所谓的“近代学术”，是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上得以延伸和发展的，然而自然科学研究早已走出经典实验阶段，而人文科学仍在文献考据、逻辑推理的框架内因循蹈矩。数字人文科学研究也看作一个社会复杂系统中的问题，进而采用计算实验方法来回看历史问题的全新视角，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朝一日，相较“数字人文”更进一步的“计算人文”，也能崭露头角而日新月异。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复杂系统的计算实验方法——原理、模型与案例》薛霄著 科学出版社出版